

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 编入满洲八旗始末

吴元丰 赵志强

清崇德、顺治年间科尔沁蒙古编旗时，其所属锡伯族也被编入科尔沁蒙古旗。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政府将科尔沁蒙古旗内的锡伯族全部抽出，编入满洲八旗，分驻齐齐哈尔、伯都讷（今吉林省扶余县）和乌拉（又称乌拉吉林或吉林乌拉，即今吉林市）三城，归黑龙江将军和宁古塔将军管辖。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编入满洲八旗是锡伯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它对以后锡伯族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搞清楚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有助于对锡伯族历史的研究，而且对清史和有关地方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根据新发现的满文档案史料，对这一历史事件试作论述，以共同好。

一

十六世纪末，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建州部兴起，开始兼并邻近诸部。为了遏制建州部势力的扩张，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叶赫、哈达、乌拉、辉发、科尔沁、锡伯、
对本民族的古文字研究有较深的感情和浓厚的兴趣。他们一般都懂得本民族语言或与其相近的语言，熟悉民族古文字文献，因而也能够较快地取得科研成果。这些同志在民族古文字研究领域中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

总之，我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工作进展较快，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水平的科研队伍，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科研成果。可以说，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出现了百花齐放，初步繁荣的可喜局面。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民族古文字这一学科今后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很多十分重要的民族古文字文献目前依然散失国外，有些文种进一步深入研究尚需投入更多的力量。有些文字的释读或文献整理仅仅是一个开端，有的文种的研究工作基本上还是空白，科研队伍的业务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国内外的资料情报工作亟需加强，科研、文博、图书等部门的交流、协作渠道也应调整畅通。特别是有关民族古文字的论著，由于印刷上的不便等原因，往往难于出版，这一问题尚未引起有关部门的充分重视。这些任务都需要我们做认真、细致的工作，付出艰苦的劳动。同时我们也相信，今后在国家各有关部门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通过专业的和业余的民族古文字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这一学科一定会更加繁荣发展，不断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作者附言：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很多同志的著作，恕不一一注出，特致歉意。本文完稿后又先后请黄振华、白滨、陈宗振、张济川、刘凤翥、岭光电、张公瑾、杨甲荣、汪玉明等同志审阅，他们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卦尔察、朱舍里、讷殷等九部，联兵三万，分三路攻打努尔哈赤。双方激战于古勒山，努尔哈赤取胜，九部联兵溃败。这便是清开国史上著名的“九部之战”，也是锡伯之名首次出现于清代史籍。

“九部之战”后，努尔哈赤逐步统一了女真各部。至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登位，建立“大金”（史称后金）。随着努尔哈赤势力的强大，邻近尚未被征服的部落，包括锡伯部里也有些人望风归附，携眷投诚，并受到后金的礼遇。据天命朝《满文老档》记载：“锡伯部巴达纳弃其祖先世居之地，率丁三十名来投有功，升为备御。”^①又“胡岱、巴珠、格卜库等三人，自锡伯地方携妻子来投有功，其子孙世代勿令当差。”^②尽管如此，投诚后金者为数不多，绝大部分锡伯人仍以伯都讷为中心，居住在嫩江下游左右两岸和松花江流域，隶属于科尔沁蒙古。

后金天命、天聪时，科尔沁、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等部先后归附后金，其所属锡伯人也随之归附。清崇德、顺治年间，清政府将其编入八旗。崇德至顺治，科尔沁共十旗，统称为“科尔沁十旗”。在编设科尔沁十旗时，将隶属于科尔沁蒙古的锡伯族，也按其氏族编设佐领，分归各旗，成为蒙古八旗的一个组成部分。科尔沁十旗“每旗设扎萨克一人总理旗务，以王、贝勒、贝子、公、台吉为之。”^③各旗下设管旗章京、参领、佐领、骁骑校等官，协理旗务。锡伯人一般只能任参领、佐领、骁骑校等末职。

科尔沁王公台吉等对下属贫民进行封建剥削。清政府对此规定，“蒙古王公台吉等每年征收所属：“有五牛以上及有羊二十者，并收取一羊；有羊四十者，取二羊。虽有余畜，不得增取。有羊二者，取米六锅；有一羊者，取米一锅。其进贡会监游牧嫁娶等事，视所属至百户以上者，于什长处取一牛一马之车；有三乳牛以上者，取乳油一腔；有五乳牛以上者，取乳酒一瓶；有百羊以上者，增取毡一条。”^④锡伯人作为其所属之人，自不例外。此外，还承担各种杂役，看护王公台吉等牧场牲畜、府第庙宇。

锡伯人除向科尔沁王公台吉等纳税服役外，还要应付清政府的各种差使。如，往黑龙江等地运输物品，驿站车马人力不敷用时，常“派科尔沁十旗锡伯车辆，协助运送。”^⑤再如，协助站丁耕种田亩。“锦州鄂佛罗至墨尔根二十驿站，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创设，每年派部衙门官员，以宁古塔、乌拉官兵、锡伯、蒙古人力牛只及官丁官牛深耕相助。所获之粮，每口发给两斛，其余归公。”^⑥

可见当时锡伯人同时遭受科尔沁王公台吉和清政府的双重剥削和役使，负担是很沉重的。

二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政府将科尔沁蒙古旗内的锡伯人等全部抽出，从中挑取年

① 《满文老档》卷67。本文所引档案均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中满文档案，由笔者译校。以下皆同，不再注明。

② 《满文老档》卷70。

③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76，第1页。

④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80，第1页。

⑤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01—1685册。

⑥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09—1691册。

力精壮者为披甲,编设牛录,分归满洲八旗,遣驻齐齐哈尔、伯都讷和乌拉三城。这不是偶然的,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十七世纪中叶,沙皇俄国侵略者的魔爪伸到我国黑龙江流域,“窃据雅克萨之地,筑城居之,侵扰索伦、达呼尔。”^①清政府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出兵收复雅克萨,并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与沙皇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两国间的东部边界。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率部众东侵至乌珠穆沁,劫掠漠北、漠南蒙古诸部。大批喀尔喀、巴尔呼人逃难到黑龙江齐齐哈尔地方,使索伦、达斡尔等四处逃散,影响了地方治安。^②为了加强东北防务,防止诸如以上事件的发生,清政府命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筹办防务。康熙三十年(1691年)萨布素疏称:“臣详察东北地方形势,墨尔根城(当时黑龙江将军驻于此城)地处蒙古、锡伯、索伦及达斡尔之北,其兵民与外藩人等共居杂处。墨尔根城远离乌拉吉林一千四百余里,与之隔绝,万一有调遣之事,不能践约及时来到。松花江由南北流,嫩江由北南流,两江于图西吞地方汇合,经东省诸部落所居之地,流入东北海。自乌拉吉林至嫩江口约五百里,嫩江口至齐齐哈尔约五百里,齐齐哈尔至墨尔根约五百里。其中齐齐哈尔最为紧要形势之地,蒙古、锡伯、索伦、达斡尔等所居地界总汇于此,且距通达兴安岭北呼伦等地及尼布楚之道甚近,应于齐齐哈尔一带驻兵一队。再松花江、嫩江汇合之处,系水陆通衢,大渡所在,亦应驻兵一队。如此则齐齐哈尔、嫩江口皆以江为屏障,得其地利,兵马可赖腴田青草而强盛膘壮,驻防则坚固,出征则英武。值有紧急事宜,墨尔根、齐齐哈尔相互调遣,不致有误。且兴安岭以北,若有战事,此方面军可协同见机而行。”^③萨布素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康熙的允准。于是,决定在齐齐哈尔、松花江和嫩江汇流处筑城驻兵。

当时,由于全国驻防需要,不断从东北的满洲、索伦、达斡尔内选丁披甲,迁驻内地,致使东北地区兵源不足。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初,兵部议定在墨尔根增设火枪兵一百名,并谕令黑龙江将军萨布素酌情办理。萨布素疏称:“增加火枪兵时,将抽茂兴、科洛尔等十九站丁一百名,”其所遗之缺,“请于柳条边丁内,抽选有妻孥,能当差者补充。”^④但奉天将军绰克托和宁古塔将军佟保反对,他们咨文兵部内称:“今柳条边丁只剩六百五十三名,按地计算,每丁该看管三里余地。今若抽调边丁,则不仅毁边,行围之山亦难看护。”^⑤结果无处抽选兵丁,使增加火枪兵一事拖延到该年年底才得以解决,可见兵源何等枯竭。因此,在齐齐哈尔、松花江和嫩江汇流处筑城后,由何处选丁披甲驻守,没成了清政府很棘手的问题。清政府本打算从内务府及诸王所属布特哈丁内挑选披甲,但又怕耽误渔猎之贡,未能付之实施。几经磋商,康熙最后批示:“锡伯等所居之地,接近松花江、嫩江,相应咨文科尔沁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若有情愿将所属锡伯、卦尔察献出披甲者,俟详列其数报部后,再具本疏闻,披甲遣驻。”^⑥并声明每“献出”一丁或一户,酌情赏银若干两。

清政府所以将科尔沁王公台吉等所属锡伯人抽出编入满洲八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直接控制锡伯族,扬其善而抑其恶。毋庸讳言,当时经常发生锡伯人图财害命案件。《柳边

① 《清朝文献通考》第2册,第6434页。

②③ 参见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11—1691册。

④⑤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10—1690册。

⑥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11—1691册。

纪略》云：“特以地（指锡伯人所居之地）属外藩，公行劫夺，行旅视为畏途耳。”^①不仅往返经过锡伯人住地的单身官兵商贾时被“蒙古、锡伯劫掠伤害”，^②而且成群结队的官兵及其家眷也难免这种遭遇。康熙三十年（1691年）初，吉林官兵“携眷迁来墨尔根时，于二月初二日，正白旗波莫都佐领下西讷科之青骗马，在锡伯伯都讷屯地方被盗。十四日，正兰旗精额德佐领下星国之花骗牛，在锡伯乌聂恩屯被盗。同日，正红旗佐领额尔古勒之青骡马，在五家子地方被盗。十八日，镶白旗防御珍德依之花骡马，在锡伯萨勒巴岱屯地方被盗。……二十六日，正兰旗额舒佐领下尼木奇拉在锡伯法依法里屯北修完车赶来时，日落天黑，突来锡伯人近二十名，执拿尼木奇拉及闲散章京达勒必山家汉丁两名，将车载佛头青布十九匹、白布二匹、翠兰布一匹、对青棉袍一件、被一床、棉花五斤、弓一张、鞋三双、布靴一双、布袜一双、单裤三条、衫衣三件、鞍垫一件、辔后鞦一付、帐房一座、毡子二顶、油单一块、箭罩一对、刀一把、纸一百五十张、棉花二斤、绒线五两、膝制凉帽二顶、白布五匹、铎头三件、铎耳一件，一并抢去。同日，闲散章京达勒必山车载被一床、锅一口、腰刀一把、小豆一斗、凿子一个、铃六个、锦缎裙一件、镜子五面、大披箭二十七根、箭桶一只、柜一个，内装零碎什物、未记其数，行至法依法里屯北，突来锡伯人近二十名抢去。”^③这类案件虽然不断发生，但锡伯人众隶属于科尔沁蒙古，黑龙江将军不能亲自查办，只能咨文理藩院曰：“锡伯皆系蒙古所属之人，我等不可擅自查议。是以咨文尔院，请派官查议，还给失主。”^④理藩院接到来文后，再派官查办，已事隔月余，难以查明原委，往往不了了之。鉴于这种情况，清政府才下决心咨文科尔沁王公台吉等，将锡伯人等改编入满洲八旗，分归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管辖，置于其直接控制之下。

三

在清政府悬赏要求抽出的情况下，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初，“科尔沁王至台吉、平民，将其所属锡伯、卦尔察、达斡尔丁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八名全数进献。其中除年老之丁、年幼之童及家奴外，可披甲者共一万一千八百一十二名。”^⑤年底，又续献因病漏查的七人，“其主各赏银八十两。”^⑥这样兵源不足的问题就解决了。清政府决定将布特哈丁和茂兴、科洛尔等十九驿站丁免其抽为披甲，此项锡伯、卦尔察、达斡尔人等“皆分入上三旗”^⑦共编八十四牛录，选其中年力精壮者为披甲，派驻齐齐哈尔、伯都讷和乌拉三城。

齐齐哈尔地方紧要，从附近居住的锡伯、达斡尔人内拣选壮丁一千二百应为披甲，派往齐齐哈尔地方，筑城镇守。同时，又选丁二千四百披甲之附丁，凡“居于大路附近方便地方者，仍准其居住原屯；居于远离大路拐弯之处及嫩江西岸者，皆迁至嫩江东岸，依次安置，并酌设头目，以便督察。”^⑧此等披甲、附丁，合编为二十四牛录，其中锡伯十九牛录，兵丁共二千八百五十名；达斡尔五牛录，兵丁共七百五十名。由于达斡尔原在科尔沁时，任官者少，此二十四牛录的佐领，均以原来任官的锡伯人委任，故此二十四牛录统称为锡伯牛录。后来将齐齐哈尔的锡伯族迁驻盛京及其所属各地时，这五牛录达斡尔也一同迁去，逐

① 杨宾：《柳边纪略》，见《中外舆图说集成》卷14，第7—8页。

②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08—1690册。

③④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10—1691册。

⑤⑥⑦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01—1692册。

⑧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11—1692册。

渐融合在锡伯族之中。齐齐哈尔驻防兵丁,“令副都统职衔玛布岱管束,将军萨布素统辖。”^①

松花江和嫩江汇合处筑城之地,经宁古塔将军佟保查勘,“图西吞地方四十里外有伯都讷地方,系水陆通衢,且地势高,土地辽阔,可以在此筑城。”^②并决定“锡伯、卦尔察等向来讲田室居,相应本年(康熙三十一年)令其修房迁住,来年垦荒定居后,再令其自力乘闲修筑。”^③修衙署、仓库所需木匠,由盛京工部调用。于是,从伯都讷附近锡伯、卦尔察丁内,“拣选强壮者二千名,令其披甲,镇守新筑之城。”^④又将散居在科尔沁王等所属地方、锡拉木伦、养息牧外及辽河流域的锡伯人等,都集中起来,“以次安置于伯都讷附近,作为新城二千名驻兵之附丁,”^⑤共四千名。将此项兵丁合编为四十牛录,其中锡伯三十牛录,卦尔察十牛录。其“佐领、骁骑校,均于原有官员内拣选技艺谙练、善于管束者补放。”^⑥该四十牛录官兵,分为左右两翼,每翼设满洲协领、防御各一员管束。并令宁古塔副都统移驻伯都讷,总统其事。松花江、嫩江汇合处渡口“所关紧要”,因而从议驻伯都讷兵丁内,调拨披甲五百名,附丁一千名,移驻渡口附近北岸绰尔门地方,以便渡口畅通无阻。此项兵丁,仍归伯都讷副都统管辖。

至于乌拉增兵之事,本来不在初议筑城驻兵项内。从科尔沁蒙古旗内抽出锡伯、卦尔察、达斡尔丁后,宁古塔将军佟保等疏称:“今乌拉所有兵数,虽有三千一百名,但在宁古塔有五百三十四名。再从宁古塔、乌拉兵内,拣选能谋生者一千名移驻黑龙江、墨尔根。故在乌拉地方所剩二千五百兵内,贫困无附丁者甚众。且造船之差繁重,兵丁无暇耕种。臣等伏乞于此项进献之锡伯、卦尔察丁内选丁三千名,就近移驻乌拉,其中一千名为披甲,二千名为附丁。”^⑦奉旨准行。当时,卦尔察居住在松花江、呼伦河(今呼兰河)流域,达斡尔居住在嫩江流域,唯锡伯所居之地,距乌拉较近。故将乌拉附近的一部分锡伯人就近移驻乌拉,分编为二十牛录。^⑧为了便于安置,节省费用,将其中十六牛录官兵移驻乌拉驻守,其村庄田亩和附丁大部分仍在伯都讷地方。另外四牛录官兵驻于锡拉木伦地方,其村庄田亩和附丁亦未迁移,均在搜登、伊勒门、萨伦等处。此锡伯二十牛录兵丁,归宁古塔将军佟保(当时驻于乌拉)管辖。

齐齐哈尔、伯都讷和乌拉三城锡伯七十四牛录官兵的任务是驻防城池,坐卡巡边,保护台站渡口,防范盗贼;其附丁则自备耕牛籽种,开垦种田。当时共有附丁七千四百名,其中一半供养披甲,另一半交纳官粮,每丁年交五金斗。

四

清政府把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编入满洲八旗,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其主观目的,即加强了黑龙江和吉林地区的防务,加强了对锡伯族的控制。但从锡伯族方面言,这一历史事件,对锡伯族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促进了锡伯族向农业民族的过渡。锡伯族本为渔猎民族,进入松花江和嫩江流域

①②③④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01—1692册。

⑤⑥⑦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01—1692册。

⑧ 乌拉锡伯牛录数目,据《吉林通志》和《清朝文献通考》记载为十六牛录,与档案记载二十牛录少四牛录。疑此二书因四牛录驻在锡拉木伦地方,未归入乌拉兵额。实际上此四牛录属于乌拉兵额。康熙三十八年,此四牛录与乌拉十六牛录一起迁到京师。

后,开始兼营农业。清总管内务府“自顺治二年至康熙十一年(1645年至1672年)间,先后委派昂吉达、亚库讷、托勒比、桑额、爱善、秦泰、常素保、巴音齐哩、里塔尔、奇泰、萨尔图、库勒和哩、赛色等,每年由库领取绸、锦缎、蟒缎、纱、佛头青布、布头及包子茶等物,向锡伯、索伦人等易取黑貂皮、貂皮、猞猁狲皮、羊皮及鹿茸等物。”^①康熙三十年(1691年),为了安置散入黑龙江地方之巴尔呼人等,将军萨布素疏称:“连散入扎赉特、杜尔伯特二旗之近八百户在内,共一千五百余户,暂且分交科尔沁十旗。该十旗内锡伯人粮谷宽裕,锡伯人等所居嫩江流域,多有鱼类,相应令锡伯人等赡养,晓以食粮、耕耘、捕鱼之道。自来年起,亦由部每户得给耕牛一头、农具及籽种,令蒙古、锡伯人等教习耕耘。”^②由此可以窥见当时锡伯族社会经济状况,既掌握了一定水平的农业生产技术,又未完全脱离渔猎生产。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编入满洲八旗后,除披甲者驻防当差外,其附丁都从事农业生产。清政府提倡互助合作,鼓励勤奋耕作。规定“各旗牛录,有赤贫无耕牛者,以该牛录家资宽裕人等之犁协助耕种;有因病耽误无人耕耘耨收者,以牛录之力相助;有违令怠惰者,该官员责罚之。倘不此畏,仍旧怠惰,则来衙署首告,从重惩之。贫困无牛者,不以牛录之力相助,则将该管官员、领催等严加治罪。”^③还规定头三年免征官粮。由于清政府采取了这些有利于锡伯族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加之锡伯族自身的辛勤劳作,在短短的几年内,锡伯族的农业生产在原有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生产出来的粮食除自己消费和交纳官粮外,仍有剩余。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齐齐哈尔锡伯十二牛录协领瓦勒达、佐领扎斯泰等呈称:“我等锡伯原系蒙古之奴,蒙皇上垂佑,赎出为兵,食俸饷,赐生计,故历年足获食粮。今将迁往归化城(后改迁盛京),请将我等现在迁移十二牛录官兵之私粮一千斛,贮入本地粮仓。”^④锡伯族南迁盛京和京师等地后,由于地理条件的变化和周围民族的影响,逐渐放弃渔猎,“仅靠务农为生,”^⑤最后完成了从渔猎民族向农业民族的过渡。

其次,拉开了锡伯族东迁、西移的序幕,造成了四分五裂的分布状况。明末清初,锡伯族主要居住在以伯都讷为中心的松花江和嫩江流域,住地较集中。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锡伯族被编入满洲八旗以后,绝大部分附丁及其家眷并未迁移,仍然居住在原来的村庄。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次编入满洲八旗可以说是有清一代锡伯族历次迁移的前奏。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年(1699年至1701年),清政府为了整顿东北八旗,加强对锡伯族的进一步统治,将齐齐哈尔、伯都讷和乌拉的锡伯官兵及其家眷,分别迁到盛京、京师及山东德州等地。^⑥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为了加强新疆防务,从盛京及其所属诸城锡伯官兵内,抽调年富力强者一千余名,连同家眷迁到新疆伊犁,驻防屯田。^⑦乾隆和嘉庆年间,因京师和盛京驻防八旗生计日繁,生计困难,清政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盛京和京师锡伯官兵内,抽调一部分返迁黑龙江和吉林,开垦屯田。历次迁移的结果,使锡伯族分散于东北三省、京师、山东德州和新疆等地。

①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01—1696册。

②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06—1695册。

③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11—1696册。

④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12—1696册。

⑤ 军机处乾隆三十一年正月满文月折档。

⑥ 详见拙著《锡伯族南迁概述》,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

⑦ 详见拙著《锡伯族西迁概述》,载《民族研究》1981年第2期。

第三,促使锡伯族普遍使用满语、满文。相传锡伯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早已失传无从知道。明末清初,锡伯族除用蒙语、蒙文外,不少人还会满语、满文。锡伯族编入满洲八旗后,黑龙江将军衙门需要咨文蒙古驿站,墨尔根城里又找不到精通满蒙文的人时,就咨文齐齐哈尔副都统,由锡伯披甲内选用精通满蒙文者译写。清政府派员前往尼布楚与俄国人议事,需要蒙语翻译,又从齐齐哈尔锡伯人内选用。至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清政府“于墨尔根地方每翼各建校舍一座,设置教官,由新满洲锡伯、索伦、达斡尔及贡貂达斡尔等牛录内,各选俊秀幼童一名,教通文义。”^①这是锡伯族幼童涉足官学的开始。南迁以后,由于锡伯族基本上分散在满族内,逐渐遗弃蒙语蒙文,主要使用满语满文了。到乾隆中期,盛京的不少满族人已经不会讲满语,而锡伯族人普遍都能讲满语。^②西迁新疆的锡伯族不仅继承下来了满语满文,而且在社会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满语满文,至今仍作为自己的语言文字在使用,为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①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第02——695册。

② 参见军机处乾隆三十六年九月满文月折档。

补 刊

本刊今年第1期学术动态刊登的《土家族族源的几个问题》一文,原稿中曾有土著先民说的观点,现补刊如下:持土著先民说的同志认为,土家族自古以来就是定居于湘鄂川黔边区的土著先民,或者说以土著先民为主体,融合了以后流入的一些其他民族而形成的。持这种观点者说,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黔东北四省毗连的广大地区。两千多年以前,他们就定居在这里,此后没有大迁徙,始终保持着大分散小集中的稳定局面。从出土文物和史料来看,湘鄂川黔边区很早就有人类活动,外来人只能被本地先民融合,而本地先民不可能被外来人融合。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也不排除有外来人进入湘鄂川黔边区,但认为那只是支流,不是主流。